

世界的聲響：

日治時期台灣女性雜誌的女性主義閱讀（1919-1939）

王琬葶（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1920 至 1930 年代，日本統治下的台灣經歷現代化的洗禮。殖民地女性遭逢賢妻良母主義的現代轉型、女性自覺思潮的湧現、以及資本主義經濟對生活的衝擊。日治時期兩部女性雜誌《婦人與家庭》（婦人と家庭）和《臺灣婦人界》，作為殖民地女性現代生活的指南及提供資源的窗口，揭示了提升女性社會地位、打造新女性的目標。世界的聲響，是現代性對女性的召喚，代表一種普遍的文明女性理想。受到世界第一波女性主義運動以來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的感召，女性追求自覺與解放，擁抱現代物質文明，傳達走出家屋、進入社會、展望世界的期許。現代教養的訓練為不同階層出身的女性打造了文明階梯，鼓吹女性進入公領域成為典範。但這訴諸普遍標準的典範化過程，卻建立在對底層女性的凝視、差異化與排除之上。筆者藉女性主義學者 Susan Stanford Friedman 的「身分地理」（geography of identity）概念，解析兩部雜誌的女性創作富含階級、地緣、文化差異的多重主體位置。在北野里子、大野倭文子、黃寶桃等女作家筆下，世界的聲響為女性帶來啟蒙的信念與自由的想像，但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的理想卻也依文明優劣程度強化了他我之分，甚而突顯主流對邊緣群體的挪用和排除。現代性之於殖民地女性既是資源也是掠奪、既是解放又是壓迫的雙重面向，於此彰顯。

關鍵詞：女性雜誌、婦人與家庭、臺灣婦人界、新女性、摩登女郎、黃寶桃

緒論

1920 至 1930 年代，日本統治下的台灣經歷現代化的洗禮。女性教育制度的建立與女性社會地位的提升，促成了女性知識份子出現。當時青年男女談論著自由戀愛，主婦須學習操作現代家電與家計管理，也有許多女性走出家庭參與社會（洪郁如，2001）。職業婦女當中，不論是公司事務員、工廠女工、咖啡店女給或花街娼妓，許多女性走出家庭，在資本主義社會城鄉發展不均與貧富差距擴大的狀況下，於都會藏汙納垢的角落中求生存（齋藤美奈子，2003）。1920 至 1930 年代發行的兩部女性雜誌《婦人與家庭》（婦人と家庭）和《臺灣婦人界》，以及其中刊載的大量女性創作，記錄並回應著這種變遷。《婦人與家庭》自 1919 年發行至 1920 年，《臺灣婦人界》自 1934 年發行至 1939 年，是日治時期最關注且集中探討女性議題的媒體，也是日治時期台灣文學領域重要卻被遺漏的一角拼圖。這兩部雜誌皆已被整理出來，保存完善，惜未引起太多注意。¹

關於日治時期女性的前行研究，楊翠（1993）《日據時期台灣婦女解放運動》爬梳《台灣民報》涵括婚姻、教育、經濟、參政等面向的婦女解放論述，討論殖民地台灣女性運動從男性主導的民族與階級

致謝辭：本文部分內容曾以“Politics of Materiality: Modern Girls in Women’s Magazines in Colonial Taiwan (1919-1939)”為題，發表於 Thinking Gender: 24th Annual Graduate Student Research Conference 研討會（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UCLA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Woman，2014 年 2 月 7 日），獲 Lucy Burns 教授及與會者之點評，並獲《女學學誌》兩位審查委員及專題主編寶貴建議，特此致謝。

- 1 兩部雜誌皆保存於新北市永和區國立台灣圖書館。部分可見該館「日治時期期刊全文影像系統」（年份不詳）資料庫。部分小說文本經中島利郎（2002）整理，收錄於《台灣通俗文學集》。本文引用之《婦人與家庭》、《臺灣婦人界》文本與史料，皆為筆者自譯。

運動發芽，成立本土啟蒙性婦女團體的成果，為日治時期女性議題的開創性研究。洪郁如（2001）《近代台灣女性史》則透過日治時期以賢妻良母教養為中心的女性教育制度，觀察殖民地「新女性」世代的誕生，以及她們對自由交際、知識提升與自我實現的渴望。呂明純（2007）《徘徊於私語與秩序之間》以歐美女作家批評為方法，討論日治時期台籍女作家如何藉由寫實與抒情等策略展現女性主體對公私領域的觀照。上述研究多將焦點放在台灣本島女性，本文則將日本女性的性別表述放入版圖，以不同國族、階級、文化主體身分在相對位置的辯證與張力，解析女作家如何回應 1920 至 1930 年代第一波女性思潮之傳播、隨著現代帝國而強化的賢妻良母主義，以及經濟情勢的變化。

《婦人與家庭》、《臺灣婦人界》的女性創作深具身世談的風格。女性從日本各處來到南方殖民地、或從台灣到日本內地奮鬥的生命經驗，使這些創作富含帝國各處的南腔北調與地域風情。女性主義學者 Susan Stanford Friedman 將主體視為多重身分邊境（borderlands）、而非單一穩固本質的「身分地理」（geography of identity）概念，正適於探討這充滿多重主體位置的創作群像：

〔身分地理〕繪製疆域與邊界、內／外與中心／邊緣辯證的地域、不同身分位置中心軸的交叉、以及動態性的相遇空間——「接觸地帶」（contact zone）、「中間地帶」、邊境、前線。此外，這種〔身分〕地理論述並不強調線性增長的規律傾向，而是穩固根基的匱乏、無盡變遷的流動性、游牧流浪的跨國離散、「全球族群景觀」（global ethnoscape）的相互交融。（Friedman, 1998: 19，筆者自譯）

殖民地女性雜誌作為文化的「接觸地帶、中間地帶、邊境與前線」，繪製出各類文化主體或融和、或游離、或競爭的「身分地理」。女作家筆下各種主體身分相遇交錯，富含性別／階級／國族的權力位置間的對照關係，彰顯台灣作為帝國邊緣及移民社會的流動特性。Friedman 曾舉出多種超越單一性別／階級／國族的社會位階，如工人階級女性即具有被多重壓迫的主體，不同族群、文化的混血兒具有矛盾主體，遷徙者具混雜性主體，還有在其他主體對照下才能呈現的相對主體位置等。²《臺灣婦人界》即充滿上述這些難以歸類的主體，從雜誌中的女性作者群、單一文本中的角色關係、到角色群中的女性身體，都負載了各種主體身分之間的矛盾與差異。

如楊翠、呂明純等前行研究所示，自性別、國族或階級等單一主體位置所形成的壓迫關係切入，可以從女性、反殖民或左翼角度提出強而有力的政治意涵。但是當筆者面對《臺灣婦人界》這充滿邊境地帶混雜特性的文本，卻難以鮮明劃分壓迫與被壓迫的二元對立。此時若將主體視為一種在異與同之間的遭逢與斡旋形式，或可提供解套的可能。Friedman 指出「身分地理」概念在求同與求異之間的辯證：

〔身分地理〕一方面在熱衷於差異性及自我他者分隔的人們之間豎立邊界，無論是奠基於歷史學、生理學或兩者兼有，無論是作為支配或抵抗的形式。另一方面，〔身分地理〕探求有形的或幻想的豐饒邊境、有限的中介（in between）空間、持續運動

2 Friedman 舉出的六種社會位階為多重壓迫主體（multiple oppression）、多重主體位置（multiple subject positions）、矛盾主體位置（contradictory subject positions）、相對主體（relationality）、情境式主體（situationality）與混雜性主體（hybridity）。

與變化的位置、摻雜交融的軌跡以及自我和他者的雜種混合。

（Friedman, 1998: 19，筆者自譯）

為深化處理女性在各種地理、身分疆界間遷徙的流動主體位置，本文在性別上求同，聚焦女性創作，在國族、階級、文化敘事上存異，解析《臺灣婦人界》的女性創作中，由主體位置的流動或多重主體身分所彰顯的敘事張力，期為文本中複雜的差異主體帶來更靈活的解讀。

《婦人與家庭》與《臺灣婦人界》的發刊契機，可歸因於日本明治以來賢妻良母主義的現代化。隨著女性教育成為現代化日本立國基礎的一環，日本政府頒佈以培養文明國民為目標的女性教育準則，各地女學校陸續設立，內容從過往的儒教轉為現代化家事、家庭科學與教養培訓。1920年代，女性雜誌所呈現的新式家庭主婦一手掌理家計簿、一手操作現代家電，又因應優生學思想流行，對兒女教育煞費苦心（齋藤美奈子，2003）。《婦人與家庭》於1919年由台灣兒童世界社（台灣子供世界社）創刊，一方面刊載與謝野晶子等日本女性解放論者的主張，著重女性作為人的自主性與制度上的平等（與謝野晶子，1920a, 1920b；小島草光，1920），另一方面也受大正年間優生學與童心主義影響，鼓吹兒童、家庭本位思想，強調婦女為國家富強的根本（小島草光，1919；邱吉音治，1919）。該刊鼓勵改造本島家庭，呼籲廢除婚葬禮俗、推行和洋折衷的生活。《臺灣婦人界》於1934年發刊，主編為《臺南新報》記者柿沼文明。比起《婦人與家庭》的知識性訴求，《臺灣婦人界》用更大眾化與娛樂性的方式討論女性現代生活的各方面。透過婚姻問題座談會、家計管理講座、科學家電與育兒用品廣告（孫秀蕙、陳儀芬、王湘婷，2014）、宣導公共衛生及介紹消費、娛樂場所等等，塑造出既走在時代尖端、又宜室宜

家的現代女性形象。

女性雜誌作為女性現代生活的指南與提供資源的窗口，揭示了提升女性社會地位、塑造文明女性的目標。乘著日本女性解放思潮的湧動，許多女性撰文表達對既有家庭、社會性別結構的衝撞。世界的聲響，是現代性對女性的召喚，代表一種普遍的文明女性理想。受到世界第一波女性主義運動以來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的感召，女性追求自覺與解放，擁抱現代物質文明，傳達走出家屋、進入社會、展望世界的期許。筆者將從 1920 年《婦人與家庭》中一位值得注意的女性作家北野里子談起，解析其書寫中文明女性主體想像與賢妻良母體制的衝突。1934 年《臺灣婦人界》的大野倭文子（2002）以〈天空是朱色的〉（空は紅い）延續此番討論，探討社會自立與母職的拉鋸，並透過不同主體位置的女性以對話展開協商，打造文明女性的共同體。台灣女性作家葉陶與楊千鶴的書寫也運用相同的主题，安排各自處於不同體制邊緣的女性相遇並對話，打造女性同盟的烏托邦理想。

《臺灣婦人界》為各階層女性打造了文明階梯，現代教養的訓練讓女性得以在公領域中成為標竿。在許多女性創作中，這樣的典範化過程卻突顯出對底層他者的凝視（gaze）與排除。後殖民理論家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1985）指出，女性主義經典《簡愛》對瘋婦柏莎的非人化，成全了簡愛個人主義式的力爭上游與女性主體的追尋，Jean Rhys 在 *Wide Sargasso Sea* 中取回柏莎的姓名安東尼蒂，重新詮釋她走向瘋狂的生命史。這種排除他者以確立主體，以及從他者角度出發的逆寫，也可以從《臺灣婦人界》四位女性作家的作品中觀察到。富士晴子（1935）、若本鳥子（わかもと・とり子，1937a, 1937b）、花房文子（2002）三篇描寫咖啡館女給（特別指從事性工作）的女性創作，響應 1930 年代大眾媒體的「色情・怪誕・無意

義」風潮，³ 以女性現身說法的方式展演對底層女性的獵奇，重新鞏固賢妻良母的主流價值。台灣女作家黃寶桃（1934）描寫娼妓的小說〈巷之女〉（巷の女）則模仿「色情・怪誕・無意義」的筆法，揭露性工作者的生存處境，為被差異化的底層女性提出詮釋。Homi Bhabha（1994: 2, 85-92）指出處於殖民情境下的被支配者主體，必須以展演性的（performative）擬仿（mimicry）在文化差異性之間來回對話與協商。Friedman（1998: 77）延伸此概念，指出支配族群也參與了這種展演，甚至比被支配者擁有更多權力去展演。我將解析富士晴子、若本鳥子、花房文子的書寫如何展演底層女性他者，黃寶桃又如何以擬仿的筆法逆寫底層女性的生命史，為之提出控訴。本章從菁英女性爬梳到底層女性的文本，嘗試勾勒出《婦人與家庭》及《臺灣婦人界》創作中不同主體位置的女性群像，以及她們如何回應 1920 到 1930 年代女性主義思潮傳播、資本主義經濟崩盤的世界潮流。

一、矛盾主體：作為世界人的新女性

1920 年，《婦人與家庭》創作者北野里子的一首新詩〈心底的吶喊〉（心の底の叫びを），以象徵文明的電線，將自己定位為廣大世界的一份子：

在小小台北城的
冷冷青空

3 本文對「色情・怪誕・無意義」（エロ・グロ・ナンセンス；erotic・grotesque・nonsense）的解釋與看法，先後參照山下悦子（1988）、川村光邦（2002）與 Miriam Rom Silverberg（2006）三位學者的論著，下文將詳加說明。

縱貫東西飛舞的電線

沿著這比紡線更細的線

人們的心遠遠迴響

向內地——向都心——

然後向世界各國——

聽啊，我正訴說著

向父親

向愛人，向世界的人們

風搖動著幾條電線

讓東西的心交會

嘿，同胞啲

今後大家來傾訴

以完全敞開的心底的吶喊（北野里子，1920b）

縱橫飛舞的電線是文明的表徵，連結東方與西方，為「冷冷青空」帶來光與熱。敘事者不只屬於「小小的台北城」，更跨越地理疆界，從台北、帝國都心到世界各國。透過電線的串連，她的聲音能與父親、愛人和世人交會。她的傾訴不是寂寞的獨語，而是對整個世界敞開胸懷，且盼望著迴響。她將自己定位為世界公民，文明所及之處皆為同胞，傳達平等博愛的信息。在這種以現代文明為指標的世界主義（cosmopolitan）氛圍下，作家建構了新女性主體。

新女性的出現須追溯到日本女性參政權、解放運動及文學活動。

明治初年，福澤諭吉等學者政要接受西方現代思想，以天賦人權論立基，主張尊重女性人格，為女性解放思潮的嚆矢。在自由民權運動中，岸田俊子等女性運動者至各地發表女性人權演說，福田英子設立「蒸紅學舍」，開啟以教育促進女性社會自立的門戶（ひろたまさき，1982；山下悅子，1988: 31-98）。明治中期，具啟蒙意義的《女學雜誌》、具商業性質的《女學世界》與主張自由奔放美學的《明星》等各類雜誌相繼創刊，成為女性評論家與創作者的舞台。1911 由平塚雷鳥（平塚らいてう）創辦、成員皆為女性的雜誌《青鞜》，即為明治以來女性解放思潮與女性文學集大成的代表成果（紅野謙介，2006；市古夏生、菅聡子，2006）。

1910 年代末至 1920 年代為日本大量接受歐美女性啟蒙思潮的時期，不同源流背景的女性論述在此時喧嘩交鋒。前述女性雜誌《青鞜》以易卜生（Henrik Ibsen）《玩偶之家》特輯為第一響槍，從劇中女主角娜拉的覺醒，探討女性在父權婚姻制度與賢妻良母家庭制度下受到的雙重規範。「新女性」特輯譯介北歐思想家 Ellen Kay《戀愛與結婚》篇章，主張新式戀愛成就平等的男女關係，是自我人格的發展與完成（Suzuki，2010）。論者要求女性的離婚權與財產權，強調新女性的資格為思想獨立與經濟自立。此類自女性參政權運動以來，以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為基調的女性主義論述，散見《青鞜》專題與文學作品（吉川豐子，1998；長谷川啟，1998）。

延續上述明治時期的奠基，1918 至 1919 年以《婦人公論》為平台的「母性保護論爭」，揭示了日本女性解放思潮的三個發展面向：與謝野晶子提倡的「社會自立」、平塚雷鳥著重的「母性保護」與山川菊榮主張的「社會主義女性論」（金子幸子，1999: 103-176）。與謝野晶子質疑「女人應有的樣子」（女らしさ）是限制女性人格發展

的論調，以不能失去女人的溫順與母性為由，將女性僵固在生育與輔助男性的分業上，使女性的教育機會與創造力受制。她認為應正向看待「女子的中性化」，期許性別無差別化的社會，讓女性憑自由意志選擇作為一個「人」的生活（與謝野晶子，1980）。曾於《青鞜》登高一呼「原始女性是太陽」的平塚雷鳥，主張以發掘女性潛能為目的，將女性從家的小天地解放出來（平塚らいてう，1983a）。然而走過自身妊娠經驗後，平塚逐漸轉向對母性的重視與擁護。她認為現有的勞動條件無法讓女性兼顧生育與事業，基於社會安定與國家發展的義務，女性應尊重作為生命泉源的母性（平塚らいてう，1983b）。山川菊榮指出兩者的主張都是延續從布爾喬亞階級立場出發的女性運動，自由解放與否並非取決於個人努力的層次，倘若資本主義體制下的經濟剝削沒有改善，義務教育與照顧制度未能健全，兩方的論述皆為空談（山川菊榮，1990b）。

「母性保護論爭」揭示了 19 世紀末以來，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訴諸的理性、平權、個人主義等概念傳播至日本，並與在地女性經驗互動的過程。將視點放回殖民地台灣，《婦人與家庭》創刊號的編輯通信提及「今日時代思潮所生的一切婦女問題，也湧過了本島的岩壁。台灣的人呢？在台灣這樣的島國中又如何？對安穩美夢的追尋已不被容許，婦女也有個人的生命與純潔尊貴的人格」（作者不詳，1919）。與謝野晶子發表〈撤廢男女間的差別〉，以國際聯盟廢除人種差別為例，強調女性作為人的生存權，主張女性在法律上應與男性有同等的保障；〈婦女之力〉呼籲成立女性團體，讓女性協助彼此達成個人解放與自我實現（與謝野晶子，1920a, 1920b）。除了上述法律與社會層面的平權主張，《婦人與家庭》也宣揚女性從家庭解放。藤井夢路（藤井ゆめぢ）以激進的口吻批判許多男性娶妻僅是為了找個女傭服

侍生活，並直截了當地宣稱「沒有結婚的必要」，呼籲年輕女孩「依循婦女解放運動，從因襲到覺醒、從自覺到實行……切斷奴隸性的束縛纜繩，因棄暗投明的歡喜而泣，聽見從戀愛到事業的呼喊」（藤井ゆめぢ，1919: 28）。在現代國家制度與世界女性解放思潮的雙重影響下，《婦人與家庭》不僅強調現代女性的家庭職責，也鼓吹新女性立足社會。前述〈心底的吶喊〉一詩的創作者北野里子，便表達出賢妻良母性別分野與文明世界新女性主體之間的矛盾與拮抗。

北野里子生平不詳，從她在《婦人與家庭》發表的多篇新詩、散文與文學評論來看，她應是日本女性高等教育出身，曾於台灣居住。她經常引述歐洲文哲思想，對性別有相當前衛的見解。她的社論〈從男性中心的藝術到女性中心的藝術〉延續與謝野晶子（1980）「女性中性化」的主張，探討現代文明女性教育與職業的發展，拉近男女兩性的差距而促成新的「中性」，人人心中都有兩種性別的分裂與糾葛。她並期許一種超越男性中心的藝術風格，女性應向自身「性」的底層挖掘。她推崇丹麥籍女作家 Karin Michaelis 印象派式、片段化而不遮掩的風格，能夠將女性心情原原本本地揮灑而出，表達女性藝術的特質（北野里子，1920a）。

北野的散文〈我也是女人嗎〉（私も女だろうか）符合其文學觀，行文與思緒十分跳躍不拘，從婆婆凌虐媳婦的事件，談到女性的生命出路。此文開頭寫道：

周圍的人稱我為太太，寄來的書信寫著妳，妳無論如何都有個女字……是啊，這件用品裡放了粉，我想或許我也是個女人吧，不知不覺中就成為了女人……就這麼活著，活著——（北野里子，1919: 60）。

她理解到女人的身分並非天生而是社會所建構，是透過文字、語言、裝扮、性別分業等秩序定義而來。然而下一段在澡堂中的敘述，卻又矛盾地表達出女性被身體背叛的挫敗感：

我看見女人的身姿，看見豐滿的乳房，水蒸氣包覆的女人上半身，以及眼前女人的裸體……無論如何都與男人不同……「果然還是只能被困在家庭吧」我的心魂戰慄，垂著頭悲傷低語……彷彿可以聽到家庭之外令人懷念的呢喃。我想到那令人懷念的天地，男人有國家、有社會、有事業，更有世界，而女人……（北野里子，1919: 62）

北野里子嚮往成為文明世界的一員，卻因身體「如何都與男人不同」而「被困在家庭」，失去在社會、國家揮灑的空間，以及和廣大世界的連結。賢妻良母體制分派給女性身體的任務，無法束縛她心靈上作為世界人的自覺。她形容心中不斷呼喊自己亟欲書寫、傾訴的思緒：

即使拿起筆、展開稿紙，此刻的我終究沒寫出靈魂的語言。好想書寫，好想書寫，好想書寫我喜愛的事物。無法排遣的思緒真的讓我流下了眼淚。我面對自己的孩子也能感覺到如此程度的真實嗎？（北野里子，1919: 62）

她表達對未竟事業的不甘。對她而言，從靈魂誕生的語言、思緒、眼淚，比女性身體所孕育的孩子更為真實。北野的矛盾在於她並不認同後天建構的社會性別（稱謂、裝扮、賢妻良母職責），卻仍無法否認先天的生理性別（身體、妊娠），於是嘗試以「靈魂的語言」去超越

被視為與生俱來、源自身體的母性。

結尾時她與其他女性讀者對話：「您也還是被不可抗拒的命運所支配，在成為母親的十字路口上嗎？我衷心同情」（北野里子，1919: 62）。她在〈心底的吶喊〉透過文明的電線敞開心懷吶喊，〈我也是女人嗎〉的書寫則是她與他人（讀者）連結的契機，是她走出家庭加入世界行列的方式。然而身為女性又自許為世界人的她，如同自己社論所指出的一般，處於女性身體和人類自主心靈既重合又剝裂的十字路口。

從「母性保護論爭」到《婦人與家庭》北野里子的文章，都對賢妻良母體制提出詰問，找尋女性在文明世界的定位。天賦女性的權利、職責與展望究竟是深耕家庭還是立足社會、放眼世界？對受過教育的菁英女性而言，這樣的探求是最切身且最政治的議題。不過，這些文學作品並不給予明確的解答，而是在不一致與辯證中求索。從北野里子的作品中，筆者觀察到世界人的自由心靈與被束縛的女性身體互相齟齬，造成主體難以同一的矛盾。下一節將討論的文本，則皆以不同女性主體的相遇，呈現在矛盾衝突中試圖協商的過程。

二、異中求同：跨越身分的女性烏托邦

本節欲將大野倭文子於《臺灣婦人界》的長篇連載小說〈天空是朱色的〉，與台灣女性作家葉陶〈愛的結晶〉（愛の結晶）和楊千鶴〈花開時節〉（花咲く季節）兩部短篇並置討論。大野倭文子（1929, 1931, 1989）是在東京活動的女性撰稿人，葉陶是台灣女性左翼運動者，楊千鶴是台灣菁英女性記者，三人的背景各異。若僅以女性身分來統合其作品，勢必抹煞三人不容忽視的身分及地緣差異；如以作家

的民族或階級身分來劃分，則難以發掘三人的共通處。筆者以「身分地理」的概念切入，即看見三部小說類同的主題，皆描繪女校同窗朋友畢業各奔東西後再相遇，以主體位置各異的女性角色相逢、碰撞、對話來展開敘事，富含「身分地理」的辯證。

大野倭文子 1934 年在《臺灣婦人界》發表〈天空是朱色的〉，社方以「現代女流文壇的新太陽」形容之，表示「女史為了本誌，以新式戀愛為主題，交織了婦女運動家、女流作家、職業婦女等旨趣，捎來波瀾萬丈的大作」（大野倭文子，2002: 43）。大野倭文子自謂描繪了一位「活蹦亂跳」（飛びはねる）的前衛女性，「在她嘹亮吶喊的陰影處，有著幾百萬女性的淚水」（大野倭文子，2002: 44）。〈天空是朱色的〉女主角之一千歲，身兼女性法學士、知名作家與社會運動者，且即將代表日本赴歐參加萬國婦女大會，種種描繪皆近似大正年間訪台的女性運動者北村兼子，可能以其為摹寫對象。北村兼子曾攻讀關西大學法學科，出版《怪貞操》一書，指出男性對職業婦女貞操的批評阻礙女性進出社會，引發強烈爭議，又於 1929 年代表日本參加柏林召開的萬國婦女參政權大會。1930 年，北村受婦人每日新聞社台灣支局邀請，二度旋風式訪台，就女性參政議題巡迴演講，前後拜訪板橋林熊徵、台中林獻堂的宅邸，主要交流對象為資產階級菁英民族運動者（大谷渡，1999；大谷渡，2005a／林雪星譯，2012a；大谷渡，2005b／葉雯琪譯，2012b）。她曾在《新臺灣進行曲》描述來台演講的情形，「由於台中是無產主義者盤據的地方，奚落聲多提問者少」（北村兼子，2002: 70），透露北村在台灣並未受到左翼運動者歡迎。大野倭文子與北村兼子曾經共同為《富士》雜誌撰稿。其在《臺灣婦人界》發表作品的緣由，可能是為回應北村兼子訪台一事，並藉北村兼子的形象，塑造出一個得天獨厚的自由主義菁英女

性，並對比女性站在時代尖端的姿態和在社會陰影處的淚水兩種位置，點出前衛女性觀點的菁英本質和一般女性大眾的差距。

〈天空是朱色的〉以大量空間、對話、人物動作等戲劇腳本式的寫作風格，描述三位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畢業的同窗闊別多年後又相逢相助的過程。小說開頭即描繪光鮮亮麗的摩登女郎榊千歲與落魄的賢妻良母水並文子相遇於閃耀在夕陽下的銀座街道。千歲一身西洋勁裝，「甩開計程車、不疾不徐翩然落地」。她的雙腿「恣意闊步而又開」，「新鞋踩在乾燥步道上的觸感，是與平時不同的爽快」。千歲身為女性法學士、知名作家與社會運動者，即將代表日本赴歐參加萬國婦女大會，走在時代尖端，過著活躍的日子。相對地，因丈夫荒淫而生活左支右絀的文子，「像是要保護那貼在窗上四、五歲的女兒般」，神情憔悴地站在銀座的玻璃櫥窗前。千歲領她到摩登男女聚集的咖啡館敘舊，文子面對過往同窗，泫然欲泣地自道過了多年毫無價值的歲月。千歲心中暗想：「同在這個東京，竟有女人過著如此陰鬱、如濕地苔蘚般的生活……？」（大野倭文子，2002: 44-47）。

這段最初的描述，將兩位女性所處位置呈現鮮明對比。作者運用洋裝、高跟鞋、汽車等現代物質符號，及銀座街道、咖啡館等現代空間符號，以對西方現代物質文明的駕馭，標示出摩登女郎千歲的現代女性認同。千歲駕輕就熟地穿梭在銀座街道上，旁若無人地進出咖啡店，以這兩處深具指標性、充滿機會與開展性的現代都會空間為踏板，⁴ 走向更廣闊的世界。然而，即便千歲擁有諸多事業上的成就，觀者所欲窺視的永遠是她那難以被掌控的性與性慾。她投身婦女運動

4 Harry Harootunian (2000: 20-21) 研究日本近代文化史，指出自江戶時代開始，相對於家屋所象徵的固著、秩序與壓迫，街道顯現出各種價值觀與經驗的交匯，是代表行動力、獨立與自我實現的空間。

的報導被刊載在報紙的八卦欄，「作為萬國婦女大會的代表，流言蜚語的漩渦將她的艷容傳送到遙遠的異國」（大野倭文子，2002: 51）。千歲以一抹紅唇與香菸的紫色煙霧主動魅惑咖啡館裡年輕的歸國音樂家，對方先把她誤認成陪人散步賺取金錢的伴遊女郎，又擔憂傷及自身名譽而拒絕千歲的邀約。逸脫於賢妻良母體制的千歲，飽受媒體與觀眾的惡意注視，其實這目光也來自作者大野倭文子自身。在她筆下，千歲的成就感總是來自以性慾征服男性。她主張把精神性的現代戀愛觀念世俗化為物質性的價值交換，利用自己的女性魅力與商業謀略，周旋在上流社會與資本家之間，為留學歸國的男性知識份子引介資源介紹工作。男性需低聲下氣委身於她才能保住飯碗，轉過頭又亟欲與她撇清關係。左翼自由勞動組織試圖以美男計延攬她入夥，此舉不但未果，還促成千歲與幹部的一段風流韻事，使「神聖」的工人運動染上桃色。她的性使她如脫韁野馬，無法被任何團體套住。但看似自由的她，卻永遠只能以性來達到目的。菁英女性藉由駕馭物質文明來建構女性魅力，她的「性」卻也被放大檢視，致使性慾上的征服成為她實現自我的唯一手段。在大野倭文子的描繪中，千歲具有知識與階級優勢，同時又身為性別上被排斥的他者，浮現出女性的矛盾主體。

另一方面，賢妻良母文子被時代所拋棄。她在銀座街道上與咖啡館裡始終惴惴不安，帶著女兒穿越汽車道時險象環生；千歲形容她是「破廟裡的神」，暗指被舊時代供奉的賢妻良母形象已與現代生活格格不入。她的丈夫有從政抱負卻理想破滅，靠文子變賣嫁妝荒淫度日，並威脅文子娘家，需索無度。文子雖然受過現代教育，一面對暴虐丈夫，「她所有的教養、聰明的理智都悲慘地煙消雲散」（大野倭文子，2002: 60）。家人不斷勸她離婚，文子為了維持父母雙全的家庭，

堅持苦等丈夫回頭。眼看付不出米錢和房租，她因育兒無法求職，只能另接縫襪子的副業賺取微薄補貼。文子與千歲分別後，在泥濘路上背著女兒，腳步踉蹌，想起千歲的事業成就，對自己的落魄感到黯然。自認舊式婦女的她，為了孩子堅守賢妻良母價值，是她嚴酷生活的唯一安慰，卻終因過度勞累而病倒。文子謹守妻母之職，在性別上拒絕逾越規範，以致落入經濟困局，成了無產階級。作者透過文子的形象，塑造另一種女性的矛盾主體。

對這兩極化的女性角色，作者的目光參雜了嘲諷與同情。透過雙方的相遇情節，作者揭示不同主體位置的女性處境，也藉由第三位女主角關明子的居中交涉，呼出一個女性同盟的理想。文子臥病房中時，女高師的學姐明子帶來千歲的口信。千歲要介紹文子至藥草培養所任專職，並建議明子招募職業婦女的孩子，設立由女性經營的兒童托育事業，讓女性可同時兼顧養兒育女與社會自立。與千歲同樣自許為摩登女郎的明子，喜愛化妝打扮，認為對物質文化的追求可訓練孩子的經濟頭腦。她自稱是避孕論者，又表示自己要經營托育事業，也有與生俱來的母性感情。在明子的鼓勵下，文子走出家屋，兩人在電車上、路途間深入晤談，呈現作者在不同主體位置的女性間進行協商的企圖。大野倭文子並未特別從某一角色的立場展開敘事，而是以戲劇腳本的方式，透過千歲、文子與明子三位女性不斷的討論交鋒，激盪出不同階級、背景女性的人生經歷與處世態度，調停賢妻良母體制逸脫者與被束縛者的理念。從三位角色的相遇重逢中，作者期許女性能結為同盟，讓不同主體位置的女性兼顧母職與社會自立，回應日本女性解放思潮中「母性保護論爭」的議題。

葉陶 1936 年的〈愛的結晶〉，也是由兩位女校同窗分別後的再相遇展開。素英與社會運動者結婚，婚後經濟拮据，丈夫患了肺癆，

小孩因營養不良而眼盲。寶珠是資本家的千金，父親為了利益將她嫁給某官員，卻因患梅毒而生下白癡小孩。素英苦於無產階級生活，羨慕寶珠優渥的物質條件；寶珠卻欽羨素英能自由戀愛結婚，想起被父權封建婚姻擺佈的自己，不禁嚎啕大哭。此文的敘事張力，正在於不同主體位置的女性的遭逢與對話。素英雖面臨生存危機，為了求職而疲於奔命，卻是有自主選擇權的新女性。她原想寶珠是「不知勞苦無憂無慮的人」，但得知資產階級女性如籠中鳥的處境，「對於以前曾蔑視過的寶珠，倒覺有某種親近了」。而寶珠雖如百貨公司櫥窗娃娃般受父夫擺佈，卻是養尊處優的貴夫人。她得知素英家庭狀況的窘迫，體認到無產階級女性的痛苦，心想「愛的結晶因錢而變成瞎子，理想因錢被黑暗所包圍，這是個歹時代！」結尾中，「兩個人各自從自己的立場疼惜『愛的結晶』變成瞎子的事，也悲傷著自己的身世」（葉陶，1936／葉石濤譯，1996: 180, 184），互相安慰鼓勵。這篇小說的讀法不僅止於反映階級運動者之妻真實生活的苦況（葉陶，1936／葉石濤譯，1996: 184；楊翠，2001），也在於主體相逢後，面對彼此處境的差異，卻能夠「忘掉自己的不幸」，去感覺對方淚水滲進褲子的溫暖觸感，或哭著反過來安慰道「下次愛的結晶希望是個千里眼」（葉陶，1936／葉石濤譯，1996: 182, 184）。這種對不同主體位置他者的同理，往往綻露希望的曙光。

楊千鶴 1942 年的〈花開時節〉，描述女性在不安的少女時代短暫結盟，各奔東西又再次聚首的經歷。小說一開始描繪畢業在即的女學生們對未來茫然不安，三位死黨看著身邊好友接連出嫁，約好不要結婚，認真找尋自我。敘述者惠英在旁人的異樣目光下進入報社工作，職場的路途卻不順利，感到「快要迷失了自己」而辭職（楊千

鶴，1942／林智美譯，2001：84）。⁵ 另一位好友朱映經說媒訂下婚事，三人齊到海濱出遊歡送。兩人在沙灘上反覆寫下「友情」字跡，一再被風沙掩蓋。翠苑在岸邊鬧彘扭，朱映也向岸邊回頭，惠英執拗地獨自往前走去，象徵好友生命路途就此分歧。朱映結婚當天，惠英看她如同層層堆疊的聘禮「一節節被取走」（楊千鶴，1942／林智美譯，2001：83），卻仍帶著喜不自勝的表情，頗為不滿。這不滿來自封建婚姻視女性為物品待價而沽，原本聯合陣線的好友卻放下抗爭的姿態走入婚姻行列，留下自己孤軍奮戰的落寞。一年後，朱映生下兒子，以完成使命的姿態迎接未來為妻為母的生活。原本自棄而彘扭的翠苑，則因為學習洋裁的兩年計畫而精神百倍。惠英也從剛畢業的焦躁，轉為無論走向哪條道路皆能隨遇而安的閒適。三人再度聚首，衷心祝賀彼此的決定。

要對〈花開時節〉做出評價，須再回顧圍繞此文的文學史觀疑義。葉石濤曾指〈花開時節〉及同時代的小說「受日本帝國主義教育的影響很大，縱令對民族的歷史有些認識，但缺乏堅強的抵抗精神，因此他們的作品都是耽美的，逃避現實的」（葉石濤，1987：66，轉引自邱貴芬，2001：17-18）。邱貴芬雖反駁此文是「探討當時年輕女子所面臨的人生抉擇課題」，未必逃避現實，卻也認為小說充滿

5 楊千鶴此處並未寫明辭職緣由，不過《臺灣婦人界》中可見許多職業女性的處境與心聲。「我的結婚條件」座談會中，女記者佐藤千代子詢問與會男士對職業女性的看法，多人坦承不會選擇職業婦女為妻，作家楊雲萍更表示職業婦女會與許多男性交際，令他非常厭惡（作者不詳，1934）。又如若本鳥子〈我的告白〉描述在殖民地男性職場中，女性僅能做些倒茶掃除的瑣事，女主角閱讀流行雜誌，與異性交際，試圖追求文明生活，卻被稱為不良少女而遭革職（わかもと・とり子，1937a：59）。從史料大約可見，有著深刻性別規範、無法讓女性伸展的殖民地社會，是女性追求社會自立的沉重枷鎖。

「茫然」、「悲觀」、「閉鎖」、「徘徊與惶恐」（邱貴芬，2001：17-18，25）。這篇小說難以從民族／性別立場找出基進性，乃因它並未對特定主體處境提出尖銳批判，或提出政治正確的指導性訴求，而是描繪一個在邊界上游離惶惑的少女時代。然而這篇小說的可貴之處，即在這份「試圖開創生命空間時的徘徊與惶恐」（邱貴芬，2001：17）。作者由三位女性各自不同的嘗試與選擇，鋪陳出在賢妻良母體制內外摸索、探詢、斡旋的過程。女性的生命出路，是透過不同主體位置一來一往的衝突磨合，協商出一個讓不同體制邊緣的女性得以相互同理乃至安身立命的天地、一個作為豐饒邊境的烏托邦。從大野倭文子〈天空是朱色的〉、葉陶〈愛的結晶〉到楊千鶴〈花開時節〉，這種對話、辯證的性質是十分一貫的。

三、同中求異：「色情・怪誕・無意義」的獵奇與回眸

前兩節所討論的文本，描繪出女性在自覺思潮中與既有體制磨合的共像。無論是爭取婚姻自主與社會自立的新女性，或是透過商品自我培力（empower）、逾越性規範的摩登女郎，都乘著現代化的浪頭前進。不過，《臺灣婦人界》的女性創作亦浮現另一群女性的樣貌，被緊密鑲嵌於現代性的陰暗處，此即咖啡館女給與娼妓。如果前一節探討的是文本內不同女性角色在相異主體位置的協商，於異中求同想像出女性同盟的烏托邦，本節則要強調女性作家如何透過書寫底層女性的他者，在文本之外交鋒對話。以下將討論《臺灣婦人界》富士晴子、若本鳥子、花房文子與黃寶桃的四篇創作，她們的書寫皆聚焦於從事性產業的底層女性，但黃寶桃卻透露與前三位相當不同的旨趣。

垂水千惠曾指出，在日治時期左翼作家王詩琅筆下，咖啡館被描

繪成左翼階級運動的對立面，成為一種扁平而負面的現代性符號，忽略其中底層女性的勞動狀況，以及咖啡館作為相異主體交流空間的機能（垂水千惠，2004／羅仕昀譯，2012）。星名宏修（2007）亦從徐瓊二〈島都的近代風景〉的舞廳與咖啡廳，點明城市裡表面虛華與內部貧困僅一線之隔的「複數現代性」。從大正年間到昭和初年，咖啡館「從文化的沙龍轉變成色慾的殿堂」（斎藤美奈子，2003: 115）。如同在〈天空是朱色的〉，千歲與文子前往銀座文人雅士聚集的咖啡館，大正時期的咖啡館是高雅場所，穿著白圍裙的女給是學生與知識份子追求摩登、體驗戀愛的途徑。1923年關東大地震後，大眾化的咖啡館在傾頹的焦土上如雨後春筍般林立，逐漸成為提供性服務的風俗產業。隨著1929年經濟大恐慌而來的失業潮，無法回到貧困農村的中下階級女工在都市裡成為咖啡館女給，農村貧家的女兒被賣至娼寮，已婚婦女為維持家庭生計，也紛紛投入此行。山下悅子便指出昭和初年「色情・怪誕・無意義」（エロ・グロ・ナンセンス；erotic・grotesque・nonsense）這獵奇、炫奇的流行有此黯淡的背景（山下悅子，1988: 141-157）。「色情・怪誕・無意義」一詞源自川端康成1929年的連載小說《淺草紅團》。其中對女性歌舞秀、娼妓、流浪漢、不良少年少女等淺草風俗文化的描寫，引起一陣淺草熱（Silverberg, 2006）。1930年「色情・怪誕・無意義」成為日本媒體經常使用的套語，許多刊物報導色情咖啡店、變態性慾、奇風異俗、殺人事件等強烈感官刺激的題材（米沢嘉博、高橋洋二編，1995）。依據一般定義，「色情・怪誕・無意義」風潮代表關東大地震、資本主義經濟侵略又崩盤後，農村凋敝，都會爆發失業潮，左翼活動受到鎮壓，在這種種不安的氛圍下，社會興起一股追求頹廢享樂的風氣。異色詭奇的出版品爭相面世，成為人們在恐慌與虛無中的麻醉劑（日

本大百科全書，2014 年 4 月查閱）。正如星名宏修（2007）曾以「色情・怪誕・無意義」來形容徐瓊二〈島都的近代風景〉中，舞廳用壁紙、海報、舞女、爵士樂等拼貼而成的「摩登光景」，此風潮往往被連結到現代都會的浮面表象。然而，此題材其實深刻地刻劃出被屏除於現代理性世界之外的逸脫者與邊緣人。川村光邦（2002）即指出，「色情・怪誕・無意義」的獵奇風潮，源於大正時期性科學與心理學對「變態」概念的興趣，是分別正常／不正常、理性／非理性、現代／前現代的手段，藉此劃定甚至創造出他者的邊緣性，予以排除、隔離或以理性馴化之，並尋求自身的正當性。Miriam Rom Silverberg（2006）則認為「色情・怪誕・無意義」文化拓展了現代「性」的定義與框架，其中性邊緣者奇詭、猥瑣、犯罪的光景，突顯對經濟大恐慌下社會不平等的警覺，為邊緣群體提出抗議，批判現代性排除他者的暴力。雙方的觀點各探討了「色情・怪誕・無意義」風潮保守與激進的兩面，本節要討論的文本皆與「色情・怪誕・無意義」的流行相關，亦表現出上述的兩面性。

在 1930 年代的台灣，「色情・怪誕・無意義」也是報刊雜誌的流行語。《臺灣日日新報》以此語形容各式社會案件，包括精神錯亂、情殺慘劇、同性愛、雙性人奇聞等（臺灣日日新報，1932/5/12, 1932/8/12, 1934/7/11）。在《臺灣婦人界》上，提供性服務的咖啡館女給則成為「色情・怪誕・無意義」的醒目標籤，咖啡館裡的爵士樂、女給們的調笑和脂粉的香氣出現在許多作品中。本文聚焦的女性創作者們也描繪了這種現象。女記者富士晴子〈深夜蠢動台北的側臉〉（深夜に蠢く臺北の横顔）即以「色情與荒誕交織的街道探險」為副標題，表示「年輕純潔少女如我，想要嗅嗅臘月的台北市內那深夜的氣息」（富士晴子，1935: 55）。她刻意打扮成高尚的小姐，從西

門蹣跚到萬華、大稻埕，看見衣帶鬆脫的女給被男客攙扶而出，又進入大稻埕某間咖啡館，與一位穿長衫的女給愛子交談。愛子自述在旅行廈門時被討厭的男人奪去貞操，「終於墮落成了女給」（富士晴子，1935: 60）。聽她平靜說出自己非處女之身，敘述者目瞪口呆，在心中稱讚她歡樂街裡求生的勇敢，又記述一段女給們調笑的歌聲，唱著「做女人真沒意思」（富士晴子，1935: 61）。然而，聽到這觥籌交錯之聲，她感到一刻也待不下去，匆匆與愛子告別。這篇文章中的咖啡館，是邊緣者與獵奇者兩種相異主體交鋒的場所。富士晴子一開始刻意強調自己的「純潔」、「高尚」，表示出面對底層世界的強烈武裝。與愛子相處的過程中，她不斷強調中產階級、貞潔自我與底層階級、墮落他者的分野，她的同情也是建立在異己的差距上。

富士晴子筆下的女記者與女給相遇，突顯了相異主體的身分界線；若本鳥子的故事則描繪上班族女性成為女給後又嫁為人妻，呈現主體位置流動的歷程。若本鳥子〈我的告白〉（あたしの告白記）中在事務所工作的女主角灣生，在男性職場中僅能做些倒茶掃除的瑣事，想追求自由交際的現代生活，卻備受千夫所指。最後她被公司以「不良少女」為由資遣，一氣之下遠赴內地，落腳於大阪的飛田遊廓，頂著厚厚的妝容成為咖啡館女給。每夜送走客人後，還要帶著脫落的脂粉洗衣打掃，才能在瀰漫異味的擁擠閣樓睡下。不久她以女學校畢業的知識份子身分成為紅牌，進入大阪精華地段道頓堀的上流咖啡館。某日她發現賃居同屋的同事照子暗藏性病藥品，她的初夜還差點被以五十元賣給客人，才開始計謀脫身，同時努力學習縫紉技術，終於找到對象結婚回台，成為帶領十個子弟的縫紉師傅（わかもと・とり子，1937a, 1937b）。此文從中產階級的視角出發，深入底層女性勞動者的生活。咖啡館閣樓宛如楊逵〈送報伕〉派報所閣樓的女性

版本，同樣是被剝削、暗無天日的生活。然而，敘事者透過主角與賣淫同事照子之間的對比，強調知識份子、貞潔女性的自我，將底層女性與非道德劃上等號。故事最後女主角迷途知返，感嘆唯有家庭才是女人的歸宿，將女性的自我追求及性逸脫者的姿態，收歸賢妻良母的典範。

咖啡館作為天涯淪落人的去處，與台灣作為帝國蠻荒的邊緣位置有異曲同工之妙。阮斐娜指出男性文人佐藤春夫因戀情受挫到南方尋求療癒（Kleeman, 2003／阮斐娜、吳佩珍譯，2010: 126），逸出賢妻良母體制規範或威脅父權秩序的女性則被驅逐來台，「台灣是不幸以及遭欺凌者所逃亡的偏僻海島」（阮斐娜，2006／吳佩珍譯，2007: 71）。在花房文子〈兩個女人〉（女二人）中，森山與幸子在日本內地是一對情侶，然而幸子與朝鮮富豪之子結婚，森山失戀遠赴台灣。他被輕浮的同事們拉到台北某間咖啡館找樂子，意外與幸子重逢。他忍不住痛罵幸子賣淫，也疑惑她成為女給的緣由。原來幸子嫁到朝鮮後發現對方已有妻兒，決定攜子來到台灣，遇見學生時代就戀慕森山、追隨他來台染上重病的好友美子。幸子一邊在咖啡店工作一邊照顧美子，終於遇到森山，便留了一封信表示成全兩人，自己攜子和森山同事私奔。這篇小說以懸疑的筆法，試圖為浮面化的咖啡館女給形象注入血肉，也描繪兩位女性從日本中產階級女學生的位置下滑到地緣與階級的邊陲，彼此相濡以沫的情誼。然而，故事結尾仍不免透露賢妻良母主義的道德教訓意味。幸子對森山道：「請把愚蠢的女人捨在路邊，去拯救美子吧」（花房文子，2002: 158）。她符合「女學生」與「移民女性」的性道德墮落形象（吳佩珍，2005），⁶ 是封建婚姻

6 吳佩珍（2005）指出，隨著日本明治以來新女性參與公領域並開始跨國界的移動，挑戰父系家國意識形態與賢妻良母規範，媒體也開始大肆渲染女學生與移

體制的犧牲者與逃脫者，在逸軌之後卻仍選擇贖罪式的自我放逐，繼續懲罰逸脫於貞操規範的自己。而始終守著森山的美子，則得到歸宿重啟人生。

這三篇創作假女性間經驗分享與互訴過往的形式，展現對底層生活的獵奇目光，表達同情卻也小心翼翼地劃分異己，以貞操道德譴責底層社會的性逸脫者。其情節往往順應賢妻良母主義所期許的救贖模式，以底層世界遊一遭、獵奇歸來重回中產階級收尾。如 Friedman 指出支配者擁有展演被支配者的權力，文本中的女性跨越邊界的目的，乃是為了展演那被差異化的他者，迎合大眾的凝視，然後小心翼翼地劃分異己，再一次確立女性自我主體。透過主體在不同階層流動，從中產階級遊走到底層世界再回歸主流的歷程，這些文本一再鞏固了賢妻良母典範的普遍性與性別規範逸脫者的差異性。對這些投向咖啡館女給的異樣眼光，也有女性發出抗議之聲。《臺灣婦人界》社方不時向職業女性徵文，一位「牡丹咖啡館」的女給 Y 子便為備受輕蔑的女給一職打抱不平。她自述針線工作的收入有限，即使有學識也無管道進入公職或事務所，因此進入咖啡館。為了支付抱病丈夫的醫藥費和小孩的學費而拼命工作的女給，與「在官署、公司或街頭工作的眾位女性並無孰優孰劣」（Y 子，1936）。Y 子的投書透露社會制度對女性求職的限制，以及她們如何為生活所迫而投入性產業。第一節提到的日本女性運動者山川菊榮，亦曾就此議題寄稿至《臺灣婦人界》，建議設置職業介紹所等社會機關，以改善貧窮農村的少女被賣為娼的情況（山川菊榮，1937）。身為社會主義者的山川，曾表示娼妓問題是社會組織的缺陷而非女性自身的責任，最需改變的，是將

女性視為動物般對待的娼妓管理制度（山川菊榮，1990a）。她犀利指出許多娼妓出身工農階級，其人數隨戰爭或經濟不振而激增，即使嚴加取締，她們仍沒有其他謀生管道，「如果逮捕到有撫養家庭責任者，使其失業，警察面對餓死的老親幼兒作何感想？」（山川菊榮，1990c: 41）。台灣女性作家黃寶桃發表於《臺灣婦人界》的〈巷之女〉（巷の女），即描寫一位從娼養家的女性，流露深刻的社會主義觀照。

被封為日治時期台灣新文學花魁的黃寶桃（范銘如，2008: 293），一向以濃厚的社會意識與批判寫實路線為人所知（呂明純，2007）。黃氏 1935 年在《台灣新文學》發表〈人生〉一文（黃氏寶桃，1935），描寫一位在工地勞動的懷孕女性，因行動不便遭工安意外的血淋淋慘劇，表達具性別與階級意識的社會關懷。這篇小說可說奠定了後世研究者對黃寶桃的評價，但是她 1934 年於《臺灣婦人界》發表的短篇小說〈巷之女〉，筆觸與色調卻十分濃豔具現代感：

陳舊褪色的 Victrola 留聲機傳來被燻黑的音律，如蝙蝠般緊貼在街道的屋瓦，忽地向夜晚的星空飛去——。

如飢餓海豹般的男人們，尋求夜晚都市的獵奇，在巷子裡游移。寶連今夜也須壓抑著湧上的羞恥心，躲在暗處。在有月亮的夜裡，懷抱秘密的女性眼眸，美得如剃刀般銳利。

輕快的音調響起，鞋聲從步道傳來——寶連胸中直跳。

——噯，來一下嘛。

寶連從陰影處以含嬌帶媚的迷濛嗓音招呼。男人走了一小段距離，又迅速轉身回返，一邊拉了拉軟帽的帽簷，一邊靠過來。

（黃氏寶桃，1934: 117）

這都會情調很快地轉為寫實的人生慘劇。原來貌似嫖客的男人是取締私娼的警察，寶蓮被拘留了二十九日才獲釋。她心繫萎靡的乳兒和重病的丈夫，急切趕回家中。丈夫竟留下遺書，服藥自殺，臂彎抱著死去的嬰兒。寶蓮成為「如同流動的風、搖晃的河水般，無盡地怨恨這潰爛的社會、在巷弄間漂泊」的女子（黃氏寶桃，1934: 118）。

黃寶桃這篇小說，社會批判的本色依舊。寶蓮因嚴酷的經濟條件必須賣淫維持生計，又得承受法律對逸出規訓的性所施行的懲戒。文中顯露淫笑又翻臉將寶蓮拖走逮捕的警察，則代表了娼妓管理制度與取締私娼法中，公權力與性暴力的共謀（張曉旻，2013）。⁷ 黃寶桃以寶蓮形象提出的控訴，與前述山川菊榮的見解十分吻合，也戳破《台灣民報》社論以男性菁英啟蒙觀點，主張娼妓為社會公害的偽善論調（王敏川，1925/1/21）。⁸ 〈巷之女〉精準指出經濟、法律與父權體制對底層女性的多重壓迫，也揭露潰爛的是這個社會，而非在制度底層的為娼者。

考量黃寶桃批判社會的創作企圖，這篇小說開頭不採寫實手法而選擇「色情·怪誕·無意義」筆觸的描繪，便值得玩味。〈巷之女〉開頭頗為異色的描寫，似是迎合《臺灣婦人界》讀者對底層女性的獵奇視線，然而在迎上這目光的同時，女性也展現了銳利的回眸。「如飢餓海豹般的男人們，在夜晚的都市裡獵奇」這段文字，揭示嫖客、

7 殖民政府為杜絕花柳病，規定公娼必須定期至「檢徽所」接受診療，並依據「密賣淫取締規則」、「檢徽取締法」等條例取締私娼，範圍含括風化區的遊廊、貸座敷、酒家、小料理店與各村鎮小市街。娼妓被逮捕後必須強制接受侵入性的身體檢查，頒佈初期逼得許多風塵女子投淡水河自殺（張曉旻，2013）。

8 《台灣民報》王敏川之社論雖指出應透過職業教育、自由婚姻與振興工商業來阻止女性投入此行，但同時也主張娼妓為社會公害，淫蕩女子需由法律嚴加控管（王敏川，1925/1/21）。

警察以父系暴力和現代國家管理之名，對娼妓投射的掠奪性目光，與大眾媒體及讀者對賣淫女性的獵奇視線不但重合，也是共謀。「懷抱秘密的女性眼眸，美得如剃刀般銳利」，更表示當中產階級讀者欲窺視娼妓的秘密時，她背後的社會處境恐怕嚴苛得使人不忍逼視。黃寶桃這短短的篇幅裡蘊含了重層的創作企圖，不僅將現代社會經濟崩壞、法律排除性、性暴力等問題各個擊破，更暗指媒體對底層女性的獵奇也是一種暴力形式。她在大眾媒體興起的 1930 年代，以「色情·怪誕·無意義」的美學手法，回應且批判了「色情·怪誕·無意義」風潮對底層女性身體的消費、剝削與掠奪。

富士晴子、若本鳥子、花房文子與黃寶桃分屬台、日不同族裔，但她們並未在文中刻意彰顯國族的差距。富士晴子（1935: 60）〈深夜蠢動台北的側臉〉中，身穿長衫的女給愛子表示咖啡館裡並無內地人與本島人之分；黃寶桃〈巷之女〉中的娼妓寶連為台灣女性，但此文主要的關懷亦不在國族。黃寶桃異於富士晴子、若本鳥子、花房文子三人之處，應是她從根本上質疑了《臺灣婦人界》所鼓吹的女性典範化過程。《臺灣婦人界》一再宣揚的理念，就是無論何種地域、國族、行業出身的女性，都可以經由教育與努力，在體制內晉升並成為典範。富士晴子筆下的女記者、若本鳥子筆下苦學縫紉的咖啡館女給、花房文子筆下追愛的女學生，都是透過展演並排斥他者，讓自己得以進入典範化的過程。黃寶桃則打破這種女性力爭上游的自由主義理想，巧妙地模仿這種展演性以突顯差異後，再將他者之所以為他者的原因抽絲剝繭，指出經濟、法律、大眾目光等體制暴力，如何將一個女性最卑微的養家活口的心願吞噬殆盡。寶連之所以成為一個過街老鼠般的娼妓，正是因為她想要履行身為妻子與母親的職責。這種反差，也是對《臺灣婦人界》所推崇賢妻良母典範的最大諷刺。

小結

本文綜論《婦人與家庭》、《臺灣婦人界》的女性創作，探討女性作家如何回應現代化在 1920 到 1930 年代為日台女性生活帶來的變化。本文選擇女性書寫為範疇，但正如邱貴芬形容其台灣女性文學史的方法學並非「傳統史書中史家主宰史述所暗示的『單音』權威歷史緒述」，而是「架構起台灣女性創作的多向對話狀態」（邱貴芬，2001: 3），本文亦不欲尋找女性作家的「傳承」、「系譜」，而是梳理文本內外不同國族、地緣、階級、文化身分的女性主體，在同與異間辯證的光譜。在《婦人與家庭》作者北野里子的新詩、社論與散文中，現代文明所建構自由的世界主義心靈，與受到賢妻良母體制束縛的女性身體，兩造衝突中浮現出新女性的矛盾主體。《臺灣婦人界》作家大野倭文子與台灣女性作家葉陶、楊千鶴，以現代社會中相異處境女性主體的交會與碰撞突顯矛盾，並試圖協商，在異中求同中打造女性烏托邦。在《臺灣婦人界》「色情·怪誕·無意義」的獵奇風潮下，作者富士晴子、若本鳥子、花房文子與黃寶桃皆描繪從事性工作的底層女性，但前三人以中產階級女性短暫流動至底層又回歸「正途」的表演，訴諸賢妻良母規範而強化了他我之分。黃寶桃則描繪了底層女性的銳利回眸，揭露娼妓背負的社會處境以及大眾媒體獵奇風潮對女性身體的剝削，以左翼思考質疑女性力爭上游的自由主義邏輯。綜觀這些女性創作，筆者發現世界的聲響在北野里子、大野倭文子、葉陶與楊千鶴的筆下，帶來了啟蒙開化的自由主義信念與女性共同體的想像；但在富士晴子、若本鳥子、花房文子作品中，女性的典範化過程卻建立在對底層女性的凝視、差異化與排除上。黃寶桃別出心裁的〈巷之女〉批判主流對邊緣群體的挪用和排除，也解構了自

由主義女性典範的普遍準則。現代性之於殖民地女性既是資源也是掠奪、既是解放又是壓迫的雙重面向，於此彰顯。

參考文獻

- 大谷渡 (2005a) 〈北村兼子と台湾〉,《關西大學文學論集》, 55(3): 77-100。
- 林雪星譯 (2012a) 〈北村兼子與台灣〉, 吳佩珍編《中心到邊陲的重軌與分軌：日本帝國與台灣文學・文化研究》, 63-102。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
- 大谷渡 (2005b) 〈北村兼子と林獻堂〉,《關西大學文學論集》, 54(4): 121-143。葉雯琪譯 (2012b) 〈北村兼子與林獻堂〉, 吳佩珍編《中心到邊陲的重軌與分軌：日本帝國與台灣文學・文化研究》, 103-137。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
- 王敏川 (1925 年 1 月 21 日) 〈對於廢娼問題的管見〉,《台灣民報》, 4。
- 吳佩珍 (2005) 〈家國意識形態的逃亡者：由田村俊子初期作品看明治期「女作家」及「女優」的定位〉,《中外文學》, 34(5): 87-106。
- 呂明純 (2007) 《徘徊於私語與秩序之間：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女性創作研究》。台北：學生書局。
- 阮斐娜 (2006) Destination Taiwan! ——Exploring Japanese colonial travel writings, 發表於行政院文建會主辦、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系及中國文學系承辦「台灣文學藝術與東亞現代性」國際學術研討會, 11 月 10-12 日。吳佩珍譯 (2007) 〈目的地台灣！——日本殖民時期旅行書寫中的台灣建構〉,《台灣文學學報》, 10: 57-77。
- 邱貴芬編 (2001) 《日據以來台灣女作家小說選讀 (上)》。台北：女書文化。
- 垂水千恵 (2004) 〈東京／台北：カフェを通して見るプロレタリア文学とモダニズム〉,《横浜国立大学留学生センター紀要》, 11: 87-96。羅仕昀譯 (2012) 〈東京／台北：透過 café 的角度看普羅文學與現代性〉, 吳佩珍編《中心到邊陲的重軌與分軌：日本帝國與台灣文學・文化研

- 究》，243-264。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
- 星名宏修（2007）〈複數的島都／複數的現代性——以徐瓊二的〈島都的近代風景〉為中心〉，《台灣文學與跨文化流動·東亞現代中文文學國際學報》，3（台灣號）：177-196。
- 范銘如（2008）〈新文學女性作家小史〉，《文學地理：台灣小說的空間閱讀》，291-303。台北：麥田。
- 孫秀蕙、陳儀芬、王湘婷（2014）〈再現「現代女性」：日治時期《臺灣婦人界》的廣告圖像符號研究〉，吳詠梅、李培德編《圖像與商業文化——分析中國近代廣告》，207-232。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
- 張曉旻（2013）〈日治時期台灣性病防治政策的展開〉，《台灣史研究》，20(2): 77-122。
- 楊千鶴（1942）〈花咲く季節〉，《台灣文學》，2(3): 144-160。林智美譯（2001）〈花開時節〉，邱貴芬編《日據以來台灣女作家小說選讀（上）》，66-93。台北：女書文化。
- 楊翠（1993）《日據時期台灣婦女解放運動：以《台灣民報》為分析場域（1920-1932）》。台北：時報。
- 楊翠（2001）〈〈愛的結晶〉導讀〉，邱貴芬編《日據以來台灣女作家小說選讀（上）》，60-63。台北：女書文化。
- 葉石濤（1987）《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文學界。
- 葉陶（1936）〈愛的結晶〉，《新文學月報》，1: 11-14。葉石濤譯（1996）〈愛的結晶〉，《台灣文學集一》，179-184。高雄：春暉。
- Y子（1936）〈特徴ある各職場からの報告お互女性は反省すべきである・カフェボタン〉，《臺灣婦人界》：3(8-9): 144-145。
- ひろたまさき（1982）〈文明開化と女性解放論〉，女性史總和研究會編《日本女性史》，第4卷近代，1-40。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

わかもと・とり子(1937a)〈あたしの告白記(その一)〉，《臺灣婦人界》，4(8): 56-63。

わかもと・とり子(1937b)〈あたしの告白記(その二)〉，《臺灣婦人界》，4(9): 66-75。

大谷渡(1999)《北村兼子——炎のジャーナリスト》。大阪：東方出版。

大野倭文子(1929)〈謎の麗人——黒い瞳に秘められた清麗な憧れの偶像とは?〉，《富士》，2(11): 70-91。

大野倭文子(1931)〈街の湯賣り〉，《糧友》，6(9): 104-114。

大野倭文子(1989)〈知識階級の婦人へ〉，明治大正昭和新聞研究会編《新聞集成昭和編年史》，304。東京：新聞資料出版。

大野倭文子(2002)〈空は紅い〉，中島利郎編《台湾通俗文学集》，第1卷，43-122。東京：綠蔭書房。原出處見大野倭文子(1934)〈空は紅い〉，《臺灣婦人界》，1(3): 34-47；1(4): 49-64；1(5): 39-54；1(6): 47-63；1(7): 73-89。

小島草光(1919)〈大人本位の家庭から子供本位の家庭へ——子供を天性の儘に發育せしめろ——〉，《婦人と家庭》，1(1)（創刊號）：4-7。

小島草光(1920)〈主婦の働きは何よりも先づ人間であれ〉，《婦人と家庭》，2(2): 2-5。

山下悦子(1988)《日本女性解放思想の起源——ポスト・フェミニズム試論》。東京：海鳴社。

山川菊榮(1937)〈一人一話・貧乏農村の娘〉，《臺灣婦人界》，4(1): 134。

山川菊榮(1990a)〈日本婦人の社 事業について伊藤野枝氏に与う〉，鈴木裕子編《山川菊榮評論集》，16-28。東京：岩波書店。

山川菊榮(1990b)〈母性保護と經濟的獨立——与謝野・平塚二氏の論争——〉，鈴木裕子編《山川菊榮評論集》，61-83。東京：岩波書店。

山川菊榮（1990c）〈現代生活と売春婦〉，鈴木裕子編《山川菊榮評論集》，29-51。東京：岩波書店。

川村光邦（2002）〈日常性／異常性の文化と科学：脳病・変態・獵奇をめぐって〉，《岩波講座近代日本の文化史〈5〉編成されるナショナリズム》，83-117。東京：岩波書店。

日本大百科全書詞條：【エロ・グロ・ナンセンス】。〔online〕. 2014/4/10.

Available: <http://japanknowledge.com/library/>

日治時期期刊全文影像系統〔online〕. 2010/6/19.

Available: <http://stfj.ntl.edu.tw/cgi-bin/gs32/gswweb.cgi/login?o=dwebmge>

中島利郎（2002）《台灣通俗文学集》，上下二冊。東京：綠蔭書房。

北村兼子（2002）《新台灣進行曲》。東京：ゆまに書房。

北野里子（1919）〈私も女だろうか〉，《婦人と家庭》，1(12): 60-63。

北野里子（1920a）〈男性中心の藝術から女性中心の藝術へ〉，《婦人と家庭》，2(2): 29-31。

北野里子（1920b）〈心の底の叫びを〉，《婦人と家庭》，2(3): 42。

市古夏生、菅聡子（2006）〈日本女性文学年表〉，市古夏生、菅聡子編《日本女性文学大事典》，379-454。東京：日本図書センター。

平塚らいてう（1983a）〈元始、女性は太陽であった〉，《平塚らいてう著作集》，1，14-27。東京：大月書店。

平塚らいてう（1983b）〈いま一度母性保護問題について与謝野晶子氏に寄す〉，《平塚らいてう著作集》，2，360-373。東京：大月書店。

吉川豊子（1998）〈『恋愛と結婚』『エレン・ケイ』とセクソロジー〉，新・フェミニズム批評の会編《『青鞥』を読む》，243-268。東京：学芸書林。

米沢嘉博、高橋洋二編（1995）《乱歩の時代：昭和エロ・グロ・ナンセン

ス》。東京：平凡社。

作者不詳（1919）〈編集だより〉，《婦人と家庭》，1(12): 86。

作者不詳（1934）〈花嫁に對する憧れを語る會〉，《臺灣婦人界》，1(7): 39。

花房文子（2002）〈女二人〉，中島利郎編《台灣通俗文學集》，第1卷，155-160。東京：綠蔭書房。原出處見花房文子（1935）〈女二人〉，《臺灣婦人界》，2(8): 21-27。

邱吉音治（1919）〈婦人の活動は何を本位とするか〉，《婦人と家庭》，1(12): 15-21。

金子幸子（1999）《近代日本女性論の系譜》。東京：不二出版。

長谷川啟（1998）〈〈新しい女〉の探求—附録「ノラ」「マグダ」「新しい女、其他婦人問題に就て」〉，新・フェミニズム批評の会編《『青鞜』を読む》，285-304。東京：學藝書林。

洪郁如（2001）《近代台灣女性史》。東京：勁草書房。

紅野謙介（2006）〈女性作家とメディア——「処女地」のひとつと〉，市古夏生、菅聡子編《日本女性文學大事典》，360-366。東京：日本図書センター。

斎藤美奈子（2003）《モダンガール論》。東京：文藝春秋。

富士晴子（1935）〈深夜に蠢く臺北の横顔〉，《臺灣婦人界》，2(10): 55-62。

黃氏寶桃（1934）〈巷の女〉，《臺灣婦人界》，1(10): 117-118。

黃氏寶桃（1935）〈人生〉，《臺灣新文學》，1(1): 20-22。

與謝野晶子（1920a）〈男女間の差別撤廢〉，《婦人と家庭》，2(9): 4-5。

與謝野晶子（1920b）〈婦人の力〉，《婦人と家庭》，2(12): 8-10。

與謝野晶子（1980）〈「女らしさ」とは何か〉，《定本與謝野晶子全集》，18，253-264。東京：講談社。

臺灣日日新報（1932年5月12日）〈エログロ埋葬の情死體から女の死體を

攫ふ大磯署が犯人を嚴探〉，《臺灣日日新報》，夕刊第2版。

臺灣日日新報（1932年8月12日）〈眞夏の午後のエロナンセンス精神錯覺者の無錢遊興〉，《臺灣日日新報》，夕刊第2版。

臺灣日日新報（1934年7月11日）〈盗んでは浸る罪の男色變愛意外！獵奇家の中に知名の士老練刑事の手に罪狀暴露〉，《臺灣日日新報》，夕刊2版。

藤井ゆめぢ（1919），〈斯くの如き男に掛るな忌むべき近代結婚の新傾向〉，《婦人と家庭》，1(12): 26-29。

Bhabha, H. (1994)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Harootunian, H. (2000) *Overcome by modernity: History, culture and community in interwar Japa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Kleeman, F. Y. (2003) *Under an imperial sun: Japanese colonial literature of Taiwan and the South*.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阮斐娜、吳佩珍譯（2010）《帝國的太陽下：日本的台灣及南方殖民地文》。台北：麥田。

Friedman, S. (1998) *Mappings: Feminism and the cultural geographies of encount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ilverberg, M. R. (2006) *Erotic grotesque nonsense: The mass culture of Japanese modern tim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doi: 10.1525/california/9780520222731.003.0002

Spivak, G. C. (1985) Three women's texts and a critique of imperialism. In H. L. Gates, Jr. (Ed.), *"Race," writing, and difference* (pp. 262-280).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uzuki, M. (2010) *Becoming modern women: Love and female identity in prewar Japa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The Voices of the World: A Feminist Reading of Women's Magazines in Colonial Taiwan (1919-1939)

Wan-Ting Wang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From the 1920s to the 1930s, Taiwan under Japanese rule faced a whirlwind of modernization. Women in colonial Taiwan experienced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the “ryōsaikenbo” (good wives and wise mothers) system, the influence of the first wave of feminism and the impact of capitalist economy. This paper aims to investigate how women writers in *Fujin to katei* (1919-1920) and *Taiwan Fujinkai* (1934-1939) responded to these transitions. “The voice of the world” was a compelling call for modernity, one which lifted up women’s self-consciousness, praised the imagined sisterhood, encouraged women to join in public spaces, and formed a universal paradigm for civilized modern women. However, this “universalizing” process was founded on the gaze upon subaltern women and the elimination of differences. With Susan Stanford Friedman’s concept of “geography of identity,” I will examine the dialectical encounters between different female subjects in women’s literary writings in the two magazines. In Kitano Satoko, Ōno Shizuko, Huang Pao-tao and other women’s works, the voice of the world brought about belief in enlightenment and the imagination of liberty, but this liberalist ideology also intensified the division between the majority and minority. This contrast manifests the double sides of emancipation and

exploitation of modernity in colonial Taiwan.

Keyword: Colonial Taiwan, women's magazines, *Fujin to katei*,
Taiwan Fujinkai, new women, modern girl, Huang Pao-tao

◎作者簡介

王琬蓁，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生，著有碩士論文《世界·民俗·帝國——《臺灣婦人界》小說研究》。

◎聯絡方式

電子郵件：wt@nccu.edu.tw